

# 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青年翻译家们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自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佛典翻译丰富了中文词汇和思维;近代,以严复为代表的翻译家,掀起了理论乃至社会革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影响了格非、苏童、余华等一代作家。当下,外文原著越来越容易获取,“机翻”唾手可得,青年译者们如何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如何看待当下翻译与译者的使命和责任?

近日,在由译林出版社和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承办的首届青年翻译家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的数十位青年翻译家、学者和作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发来种种提问与回音,构建了生动的文学现场。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张垚任/文 顾炜/摄



首届青年翻译家论坛

## 声音



不夸张地说,我的整个精神世界绝大部分内容是译林出版社提供给我的,是翻译提供给我的。翻译文学将关于人、有关活着、有关面对内心、有关未来的生命等问题送到我的面前,一个乡村少年也就是在这些问题面前成长的,尽可能让自己活得更好、更合理、更文明。在座的青年翻译家比我们更幸运,你们一生中翻译了多少作品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拥有让本土的文明与世界文明比较、互鉴、批判的能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毕飞宇

## 如何带来更好的翻译文本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理论。一个多世纪过去,与会青年翻译家们提出,基础翻译问题至今仍值得探讨和研究。更核心的问题是,当下的译者如何带来更好的翻译文本。

复旦大学英语系讲师、译者朱绩崧在收到同行寄来的翻译作品之后,偶尔会与原著对照着看,其中甚至有很多悖于原文的翻译错误。他认为,讨论文学翻译,核心的问题依旧是“信”,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佛教翻译能成为中国翻译历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原因之一就在于译者对于佛教经典有了充分的理解,“译者应该充分地理解原文,以简洁的汉语传达作者本来的意思”。

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译者韦清琦提出,作为江苏或者中国的译者,翻译行为理应有地方地理以及历史精神的印记和支撑,应该基于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翻译。2019年,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文学之都”,韦清琦认为这个译名虽然很好,但英文原文使用的是“city”,意为“城市”,在他看来,南京的文学品格是谦逊且虚怀若谷的,自称为“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和单一性,因此,他认为更好的译文应该是“世界文学城市”。

当我们回望清末民初的翻译家在现代汉语方面创造性的工作时,也不能忽略,当下学科设置的泾渭分明也可能造成译者在汉语语言使用方面的遗憾,而一位好的译者一定是优秀的母语使用者。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译者李双志认为,翻译就像一种出入于不同语言的修炼,译者需要克服当下不同语言学科之间的断裂,实现再度融合,从优秀的汉语文学当中获得滋养。

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译者张伟劼也有同感。在他看来,翻译的过程也是不断逼着自己重新学习汉语的过程。他在对中文“查漏补缺”的过程中,发现方言其实代表了汉语的另一种可能,在他翻译的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中使用了很很多墨西哥地区的方言,为了准确表达这种文本特色,他会借鉴中国某些地区方言中比较有特色的表达来进行翻译。同时借由这种了解其他地区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翻译,他也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外国文化,因为‘知彼’才能‘知己’,了解外国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

## 面对人工智能,译者何去何从?

最近,ChatGPT对文学创作的冲击成为讨论热点。有人试过,用基于GPT-3.5的程序翻译一本书,只花一个小时,可用率高达99%。当“机翻”触手可及,译者是否还有不可替代性?这一话题也引起了青年翻译家们的热议。

“文学翻译最难解决的其实是选择问题,译者需要综合语法结构、上下文含义、信息配比、表达效果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译文。面对这种平衡的选择,面对修辞、面对文化障碍,人类常常也是非常无奈的。”作家、译者黄昱宁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看到机器人的优势。她认为,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判定翻译或创作优劣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正在或即将悄然发生改变?当欣赏趣味机器化的标准或趋势渐渐变得势不可挡的时候,文学真正的危机就来了。

黄昱宁以萨莉·鲁尼的小说《正常人》和《聊天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的受欢迎为例,说明新技术对文学产生的更深层的冲击,其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世界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文本越来越符合年轻人的心理,变得更加简单化。

作家、英语译者于是也从这些年翻译的文本中发现了简单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受到新媒体和科技的影响,文本变得简单化,作者渴望被翻译,甚至渴望被机翻。”这种简单化和扁平化的趋势表现在读者对于长句的拒斥,也表现在国外的科幻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后,与中文科幻小说的差异越来越小。

对这一趋势,作家小白也表示认同,“无论是中国文献或者是西方文献,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翻译,已缺乏多层次的复杂度。这也是对我们创作者提出的挑战,如何保住文学的复杂性,保住文本复杂的意向意图,这就是文学和翻译领域还需要人类工作者存在的理由。”

面对人工智能,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表现得更为乐观,“虽然大部分翻译工作确实可以用机器替代,但创作是无法替代的。ChatGPT的到来,对人类的创作行为来说不是灾难。当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时,为了消耗体能,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健身方式。当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文字工作时,人类会为自己的表达愿望创造出更为主动和活跃的方式。”

“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被人类翻译出来。”毕飞宇表示,“毕竟创作是人类的本能,其中的感受可能机器大脑无法处理。”

## 提供新的文学语言和美学经验

北京大学西葡意语系副教授、译者范晔翻译的小说《三只忧伤的老虎》在2021年出版时,一度引发文学界关注。这本书是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拉美“文学爆炸”风潮中最独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文本充满了语言游戏、文体实验、文本互动。在小说的某一章节中,作者甚至戏仿了七位古巴作家的写法来书写同一个事件,范晔坦言,自己在翻译这一章节时尝试了很多方式,但结果并不太如人意。他由此产生困惑:面对前辈西语翻译家及其翻译作品带来的“影响的焦虑”,自己的翻译能否起到类似的功用,还是成为了一种“自娱自乐”?

“在引进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我们作为编辑或译者都承担了策展人的角色。”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译者许小凡认为,译介世界文学依然能够为中文提供新的文学语言和美学经验,但重点在于选择译介怎样的文学来影响中文,“当下英语世界的文学题材或内容单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聚焦于中产阶层或学院生活,而拉美世界的文学则更具活力。我们的文学品味和文学引进需要避免这种陷阱。”

在《世界文学》常务副主编、英语译者叶丽贤看来,由其他语言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汉语的文学”的一部分,与汉语原创文学和国内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相互映照和影响的关系。如今国内读者已有多种渠道深入接触外国文学,“倘若这些译介作品的情节、思想、思路、章法、意象、隐喻、句法、调性、知识点能进入包括作家群体在内的国内读者的阅读视野,对他们有所触动或启发,赋予重新打量自身处境的眼光,并进而而在某个环节或层面影响他们的写作,或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我想这都可以算是渗入广义的‘汉语的文学’里,成为其骨血或肌理的一部分。”叶丽贤说。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没有给历史创造新的东西,没有提供新的美学经验,后来人会说我们这一代人空空如也,是被浪费掉的一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岳说,文化是一代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链条上极其紧密的一环,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会构成创造的一部分。有这样的主体意识之后,才能结成一网,从而真正创造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汉语文学。



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文学翻译是分不开的,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中,文学翻译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翻译家们应该聚焦于探讨如何通过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双向译介,进一步做好世界文学的翻译工作,把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介绍进来,同时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工作,将优秀的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推荐出去,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的资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推波助澜。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朱晓建



现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将翻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原创文学的互动作为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线索。五四以来,鲁迅等一代又一代作家为白话文树立了汉语文学创作的典范,但他们中的很多同时也是翻译家。翻译文学不仅参与创造现代文学,同时也参与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创造了“文学的汉语”。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主任 何平